

为了在重工业领域不断扩大再生产，必然要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就必然要不断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就必然要采取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政策，潜在的战争风险又反过来刺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大对重工业的持续投入。于是，帝国主义的出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列宁由此完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革命范式转换，他创造性地把《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框架，亦即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改写为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民族斗争。于是，不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爆发革命，而是边缘的落后国家率先爆发革命。在此意义上，列宁完成了革命逻辑的东方翻转。“列宁转向”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民族斗争提升到了与阶级斗争相并行的世界历史高度。民族问题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缘性问题，而是关键议题之一。

在“列宁转向”之后，东方马克思主义便迈入了世界历史舞台。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大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分别展开研究。事实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饶有意味的对话关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比较研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值得期待的思想纵深空间。例如，自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社会的“滞胀危机”和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从组织化阶段进入以弹性生产为基础的后组织化资本主义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展开，构成了平行的“两个五十年”，而这正是透视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规定性。当代左翼所涉及的多元的身份政治、差异的社会接合、交往的商谈伦理、承认的规范诉求、公正的抽象讨论，依旧在形式合理化批判的延长线上，从而错失了“两个五十年”的根本性问题，这在哲学中就表现为批判理论的表象化，在现实中则表现为解放运动的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现代性的“时空压缩”的处境中，历经 80 年代的主体性解放与 90 年代的全球化、市场化浪潮，由此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构建起超越资本逻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相信，“两个五十年”的比较研究，不仅能增进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识，也将产生一批富有原创力的思想成果，打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全新格局。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的“往后做”，即从马克思到当代中国的理论史脉络的重新梳理，有助于拓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纵深。只有完成这项严肃而艰巨的理论工作，马克思才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批判符号或一堆“死去的文本或观念的集合”，而是依旧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之中的深刻理论。毕竟，深刻把握并领会当代社会存在的内在逻辑，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这是由马克思“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所决定的。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马克思发展道路理论的哲学意蕴研究”(21DTR003)、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面向新时代的发展理论研究”(22JJD710001)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梧，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1)。]

## 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

——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创新发展

祁 涛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冲击之下，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新挑战。一方面，新知识生产方式对于学术研究的传统范式影响深远，学者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知识的基础与研究方法论的更迭问题；另一方面，知识危机的背后又引发了人的存在危机。福柯曾经在《词与物》中论述，“人之死”与作为知识主体之死密切相关，因此，当前学术研究所面临的范式危机，必然指向全新的知识与

人之存在关系的讨论。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原本在单一学科领域内的深耕性研究都难以应对知识生产的总体性危机，这必然要求不同学科主动地打开学科壁垒，通过不同研究方法的交叉，合作贡献对于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回应与探索。国内学界一般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总称为“哲学社会科学”，这通常只是不同学科门类的合称。在新的时代状况下，“哲学社会科学”到了需要主动整合为一门总体的知识体系的时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脱胎于近代欧洲的“精神科学”传统，它也不断吸收并回应 19 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从来不在方法上将自身局限在哲学观念研究的领域。因此，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创新，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旨趣内在一致，并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休戚与共。

## 一、“精神科学”的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经典论断中，基本上概括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与之对应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区分固然有效地凸显出哲学、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位置，但人们很少意识到，这种区分已经是 19 世纪末各种社会科学学科化之后的观念。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相对独立出来之后，似乎就不再实质性地联系于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20 世纪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都各自圈定了严格的研究对象。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本体论研究、辩证法研究也不再关注具体的历史、社会与人物，大量是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

早在 20 世纪初，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就注意到这一现象所带来的问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曾批评当时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希望在方法论上将马克思主义改造为“纯粹的”科学，进而与现实的社会运动区分开来。卢卡奇指出，这种让理论与实践陷入二重性的思想，脱离了社会现实的基础，就会带来主观主义以及丧失对于社会现实的把握。<sup>①</sup> 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理论、政治理论的分离，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都在某个单一的领域内部，只可能局部地靠近社会现实，却永久地与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相分离了。

从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议题，但只要返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这其实关涉对“什么是科学”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这一问题的提出，不单单是反思科学与世界的关系，更是在人的生存意义遭遇挑战之后，对于广义科学的内在危机所展开的一次反思，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也一并从属于这个思想运动。因此，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是注意到理论与实践并非处于天真的统一关系，科学理论的合法性危机将直接危及革命实践的有效性。可以说，20 世纪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的讨论，隶属于整个欧洲思想界反思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危机的大背景。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存在方式就已经渐渐拆分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维科在反对笛卡尔主义时指出，演绎法可以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但理解人的历史存在则是通过“明智”，即实践智慧。前者是理性的形而上学，后者则关注历史变迁背后的实践知识。这标志着古代直接的、统一的形而上学体系的瓦解，各类知识被分殊为各个门类，再重新拼成一个整体。因此，近代以来的思想任务是希望用新的统一形式来重建普遍知识，但不同类型的知识依然实质上是分离的。以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然哲学为例，它被长久地忽视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它的思想使命。德国古典哲学意识到自然科学只是在各个分支中阐释自然规律，但它们无法在整体世界图景中理解自然科学的意义，将科学知识 with 哲学相结合的需求就成了哲学的必要任务。与此同时，德国古典哲学也主动摆放自然哲学与逻辑学、精神哲学在科学体系内的不同位阶，明确其在精神序列发展中的位置。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化中，科学（Wissenschaft）特指的是对各类知识的整体研究。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延续了这一理念并加以发展：“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②</sup> 这种大写的科学还总体性地规定各个具体领域的规则和方法，也才呈现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76 页。

②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87 页。

出主体与客体在总体中的辩证关系。

到了 19 世纪末，精神科学主动与自然科学相分离，但就关于人的研究来说，精神科学作为一种完整的知识，不仅要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全部知识，而且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客观性认识，并设定规则与价值取向。狄尔泰的学说就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这一点，他认为，（精神科学）“始终涉及同一实际存在物：人类或人类—社会—历史实在。我们可以根据这组科学对同一事实（人类）的共同关涉而界定它们，并且将它们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sup>①</sup>。狄尔泰借此表明，将自然与人类的一切知识加以系统化的形而上学努力，恰恰是阻碍精神科学成为严格科学的体系。狄尔泰在拒绝相对主义与形而上学建构的前提下，继续坚持精神科学的整体性，反而内在地展现了现代科学的危机。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表明精神科学在西方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已经终结，各学科的独特属性与独特方法已经无法抹去，精神科学获得承认的至多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立场。

胡塞尔是这样评价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科学危机的：一旦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这场科学的危机就会从精神科学的危机，进一步发展为生活世界意义的丧失。他敏锐地指出，这场危机的实质“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的科学对于人生已经意味着什么，并能意味着什么”。因为，实证科学仅仅告诉人们物理世界，精神科学也只能回答精神世界，胡塞尔进一步追问：“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sup>②</sup> 这一追问深刻地认识到，伴随着科学的危机，人的存在与生活世界也同时陷入意义与价值的危机之中。

作为最具现实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回应科学与意义危机的时候，也须重新反思自身的方法论。在精神科学危机的背景下，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不能保持内在的整体，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就分属于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之内，正如当前相应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它们受限于本学科领域的划分，并且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去触碰别的领域。只要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还被拆分为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无法建立“人的科学”。恩格斯曾这样评价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积极影响：“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但是，这三位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绝不是孤立地起作用，德国的理论是整体性地吸收继承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并且“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sup>③</sup>。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性的哲学社会科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也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深入融合进社会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中，研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人的科学”。

## 二、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社会存在”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唯物史观之际，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里先写下、尔后又删掉了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sup>④</sup> 这一说法延续了《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关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相统一的论断，但《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明确将统一关系涵括在历史领域。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就确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的全部历史研究。晚年恩格斯也指出：“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工作研究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sup>⑤</sup> 这些说法都表明，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领域的总体研究，如果我们用哲学社会科学加以统称的话，这种哲学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存在的现实及其历史的考察，才能得出作为整体的历

① 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安延明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74 页。

② 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张庆熊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第 981—98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16 页注。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99 页。

史科学。

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鼓励多学科之间的借鉴与交流。但目前，跨学科研究的方式依然是不同学科分别从自己领域出发，在一些重大的议题之上，尝试一些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知识的汇总。它并没有努力去融合为一门大写的科学，而是作为复数的诸分支研究的交集。所以，我们是能够非常清晰地分出传统学科研究与交叉研究的边界，交叉研究依然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补充性拓展，尚没能根本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换句话说，研究者很少去确立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方法，再深入各个领域内做细致研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知识只有作为科学或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才能呈现出来；此外，哲学的某个所谓的原理或本原，即使它是真的，但只要它仅仅保持为一个原理或本原，就已经是错误的了。”<sup>①</sup>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知识体系，它得以切中社会现实与时代主题，一定不是作为抽象的方法与知识的汇总，而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一门关于社会存在的整体科学。社会存在的历史性与实践性，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不断揭示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历史性运动。基于特定学科的片面研究，既不能完整地揭示社会存在，甚至只是关于社会存在的科学表象，也无法达到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深度。

以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为例，古典经济学家将“劳动”“资本”等仅仅看作生产的要素，并将其抽象为“劳动一般”的范畴。这种研究在古典经济学领域就仿佛具有了科学的外观，可以在纯粹理论的研究中自圆其说，甚至被进一步上升为“社会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批判性地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从范畴出发，掩盖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规定。所以，古典经济学理论只是科学地抽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运动，“按照它表现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示化的概念规定之中”<sup>②</sup>。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运动并不同于它的表象，关于其表象的“科学”学说也仅仅停留于经济要素的一般分析，并且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则依然处于被遮蔽之中。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他一方面区分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抽象（理论）同实际历史的研究对象（实在），前者只是后者在思维中的具体再现，从而保持历史实在始终是“生命的有机体”。即使理论将社会存在抽象为科学范畴，这些科学范畴也并不能掩饰社会存在是差异性的结构，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各种关系既因为其差异性而相互独立，也因为其相互依存而保持社会存在的整体性。科学研究也既不像形而上学一样抹杀具体主题的差异性，也不像实证科学那样失去对社会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关注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维度。《资本论》没有提供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模型，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研究方法。它无非表明，这些成熟经济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性关系，恰恰是在历史中具有先后顺序地成熟起来，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将《资本论》看作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作为科学的历史的理论的差别，就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只考察社会整体的相对独立的一个部分，而历史理论主要是把复杂的整体本身作为对象。”<sup>③</sup> 不难看出，坚持社会存在作为复杂的、历史性的整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的核心要义，也是维持其不作为任何一个特殊学科、而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的关键所在。

面对现有知识体系的学科化前提，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存在的整体研究，可以先区分宏观研究与具体研究，并自觉地思考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内在统一。社会存在的整体性是哲学社会科学坚持整体性的客观前提，但这并不妨碍各个学科对社会存在的特殊主题展开具体研究，毕竟社会存在始终是由社会结构的部分、各种社会关系与制度观念等共同构成的，也从来不是一个实存的单一对象。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每一门学科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原有研究领域边界的动摇，以及本学科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正是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变动所带来的研究议题，它也迫使哲学社会科学及其之下的各个学科的创新融合。人类技术发展的几次重大飞跃，都伴随着社会制度与社会观念的重大变迁，也是诞生各种新思想的历史条件。就哲学社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③ 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20页。

会科学的紧要任务而言，紧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固然重要，但不能内在地发展出适应未来社会形态的新知识体系，就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仅仅作为工具性的技术理性为科技发展提供理论“赋能”。

今天，很多迅速兴起的“人工智能+”的跨学科研究，强调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掌握人工智能工具来迭代知识，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将全面消解哲学社会科学的意义。这种基于“有用性”原则的功利思想，实质上是技术理性对社会存在的再次遮蔽。百年前，狄尔泰、胡塞尔、卢卡奇等面临的精神科学危机，如今以新的主题重新质疑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进而动摇人的存在意义。因此，新技术条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必须认识到立足于社会存在的整体性研究是保持自身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进而言之，如果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尚不能成熟地整合，那么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也同样难以深入，更不可能实现具有真正深远影响的理论创新。

###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本体论阐释

在当代科学危机、知识危机与意义危机之下，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需要再次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再进一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发展新的思想形态。回顾过去十年的学术史，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依赖于追踪时代热点问题，却很少去搭建新本体论来接纳新事物，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道，只是用自己的学科语言来描述新事物，却没能在新事物面前建立全新的解释体系。比如，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研究方面，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正义、生态危机、生命政治等议题都曾先后引发热潮，更不用说大数据、区块链直至人工智能等当前焦点议题所引发的学术生产。但是，由于缺乏新的哲学本体论，这些话题往往不能持久地带动深入研究，这些前沿研究也往往随着研究对象的热度，仅仅取得一时的思想喧哗。恩格斯曾经批评过 19 世纪末的德国青年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sup>①</sup>。今天缺乏基础理论深度耕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研究，在本质上也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套语做“贴标签”的理论工作罢了。

当代世界哲学的前沿发展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即本体论研究的强势复归。这一现象源自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一系列实践哲学浪潮的式微，其中政治哲学、技术哲学等直接展开现代性批判的实践学说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这些理论研究越是准确地描述了当代世界，越是暴露了自身在回应问题上的乏力。在这个背景之下，各类实践哲学都返回理论哲学层面，尝试去重构新的哲学本体论，从新的哲学框架下去重新回应时代主题。比如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兴起，通过重新界定“物”在本体论层面上的能动性和流动性，重新调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当代世界的急剧变动。再例如当代社会本体论的复兴，这一复兴的背后是当代政治哲学与伦理学在规范性建构上的失败，原本属于政治哲学中的共同体、公平正义等议题不得不重新下沉到社会领域得到解释，这才有了当代社会本体论重新吸收斯宾诺莎、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来回应社会危机的出现与深化。最后，再以人工智能哲学为例，区别于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人工智能哲学回归到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基础层面，也是为了回到人类的语言、心智、认知与智能之间的深层架构，并在这个维度思考大语言模型的交互与“思考”的实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返回到世界存在的根本意义上的追问。比较上述三种当代本体论研究的范式，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时代热点问题的理解还是过于应用化，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局面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本体论阐释为定向，大致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论的新阐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除了对于历史进程的一般解释，更是将世界历史聚焦在时代主题之下。在全球化出现新秩序、新变局的情况下，如何用唯物史观解释新局面，同时又发展唯物史观的内涵，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本体论的新趋势。在其他的学科研究中，全球史、区域研究等范式的转变都是主动调整旧的研究框架，重新思考区域与全球、国别与世界、文明与冲突这样的根本议题。其实，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看作是他们在 19 世纪对当时世界历史的高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99 页。

度凝练的概括，那这个文本也是从涵盖面极广的思考中提炼出来的，这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主义思想等。所以，《共产党宣言》作为宣告 19 世纪世界历史时代主题的文本，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全球化的趋势、对于阶级斗争的普遍历史化和东西方文明世界的权力关系等议题上的判定，无不是一种整体的哲学社会科学思考，并提炼为具有高度解释力的历史本体论。《共产党宣言》所具有的长久影响力，离不开唯物史观对于世界历史充满时代性的整体把握。每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也都要形成新的历史本体论。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际，他们在思想上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就是新世界观的诞生，所以历史本体论的新阐释必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其时代性的根本议题。

第二，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基础的新阐释。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存在的本体论建立在当时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如牛顿的力学体系、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等。这些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物质运动形式，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解物质运动的科学基础。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物的主导、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思辨实在论尝试建立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等，都在广义上拒绝了传统人与物的关系。这些不同理论的动机背后，是从 19 世纪作为被观测的“物质”转向了当代充满能动性、可变性、可塑性的“物”，这种物与人类并不处于二元论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关系的变革，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需重新思考其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进而提出更具当代解释力的形而上学。

第三，关于历史方位重要变革的辩证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既不是对于“僵死的事实”的研究，或是对社会存在的既定历史所进行的考察，它同时要求把握正在发生的、尚未成型的历史进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有关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就特别强调唯物史观要把握“正在变革的时代”。准确地把握眼前正在发生的历史，对于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都是巨大挑战，因为正在发生的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马克思指出，这个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①</sup>。这就意味着，一方面，时代发展的潜在道路是蕴含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之中，尤其要深入考察社会存在中的根本矛盾；另一方面，历史变革中的重大历史方位，又提供给历史实践重要契机，抓住变革时代的主题、在历史方位中率先占据优势地位的历史实践，才能够主动引领出下一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能够击中当前历史方位的核心主题，尤其是揭示当前重大历史变革的辩证性，这样的哲学研究才兼具现实性、战略性与前瞻性。恩格斯曾盛赞过马克思对于 1848—1852 年这段历史的洞见：“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sup>②</sup>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也同样需要像历史上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那样，对于眼前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时代给予辩证把握。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后者在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性质。现在的局面已清晰地表明，固守传统学科思维的学术生产正失去生机活力。在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下，追求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将是主流趋势。而在这一趋势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一定体现在本体论、方法论和历史观的重大突破。只有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为哲学社会科学成长为一门大写的科学，真正注入自己的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民族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25VMZ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祁涛，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本组笔谈责任编辑：盛丹艳）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92、468 页。